



■ 主管: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学生媒体总社  
■ 投稿邮箱:zwxsj2007@163.com

■ 刊头题字:李文海教授  
■ 出版日期:2012年11月5日

■ 网站:<http://www.zwxsj.com.cn>  
■ 总第102期

■ 主编:涂好运 朱敏 虞丹瑜  
■ 社长:张琬琦 刘寒青 姚思佳

# 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正式闭幕

## 国家汉办主任许琳致辞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即将闭幕了。两天来,与会代表围绕“汉学与世界”的主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也展开了热烈的交流和交锋,达到了会议的目的。受中国人民大学陈校长和杨校长的委托,由我来宣布会议闭幕,在宣布闭幕之前,我愿意先回答昨天没有来得及回答的专家和学者的提问。  
昨天有学者提到,现在出版业已经到了数字化的时代,“孔子新汉学计划”应该更多地支持数字化出版。对此我非常赞成,我们会投入更大的精力和财力来支持数字化著作的出版。刘乐宁教授提出,“新汉学计划”还应该包括提高外国人中文写作能力这一项目,我们认为这个提议也非常好,我们也觉得“新汉学计划”也应该包含这部分。关于希望向在外留学的中国籍学生



网络新闻社/摄

提供资助的问题,我认为你们的要求也是合理的。目前我们中国国家留学资金委员会(简称 CSC)已经设立了资助在海外攻读博士的优秀中国留学生这一项目,希望留学生能够通过这一渠道获得支持。我想我今天是回答了昨天还没有回答的问题,还有一些很好的建议我们也会虚心采纳。

八年来,孔子学院的发展状况和受欢迎的程度大大超出了外国人的预料,更大大超出了中国人的预料,甚至也超出了它的设计者和操作者——汉办的预料。当初我们办孔子学院的时候,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满足各国来不了中国的人们就近学习汉语的需要。但是不曾想,孔子学院所在的学校、社区和国家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求孔子学院教授汉语,还要介绍中国文化,开展中外教育和文化交流,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综合平台。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孔子学院远远不能具备提供这些服务的条件。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孔子学院呼唤汉学家来孔子学院讲学。包括在座的很多学者,你们都积极参与了,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按理说,中国应该派出专家学者去孔子学院介绍中国,但遗憾的是,现在中国派出的人符合条件的很少,要么是外语表达能力不行,要么是话语体系不行。面对这种供给远远不能适应需求的现状,我们经常是心急如焚的,这也是国家汉办一直以来资助世界汉学大会的根本原因。我们实在不希望丢掉孔子学院这么好的一个国际文化交流的市场,不想让各国人民失望。

泰戈尔有这样一句诗:“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报以歌。”在孔子学院总部工作的八

年风雨历程里,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这两句诗。因为孔子学院工作的需要,这些年来,我大概每年有四分之一的访问时间各个国家,每年亲自接待至少三千多名校长、老师以及议员和政府官员。我所接待的这些外国校长、专家学者都是非常杰出的人,他们对我提出的希望和对孔子学院的期待经常使我的心灵深受震撼、难以忘怀。归纳起来,意思也很简单,就是希望中国在促进世界和平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希望通过孔子学院这一平台,促进东西方文化的沟通、意识形态的沟通,以达到相互了解、相互理解,但不一定要非达成一致的效果。

我记得,2006年11月,我出席中国人民大学承办的麻州大学孔子学院成立庆典,我向当时的校长杰克·威尔逊教授创办孔子学院的原因,他深情地跟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的父母都是二战时期的美国老兵,是医疗队的医生和护士。我自己是在1945年5月8日——即停战的第二天——出生,我一直牢记着父母的教诲,这一生要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要做些事情。”因此他一生一直都在寻找一件事能够让他实现父母对他的期望。在他六十岁的时候,他遇到了孔子学院,他认为孔子学院是一项能够促进世界和平的事业,所以他要在麻州大学创建孔子学院。他说:“这是我给父母的一份礼物。”

前不久我访问了约旦的 TAG 孔子学院,这是由约旦乃至中东最大的咨询公司承办的。TAG 公司的董事长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专家委员会的十一个委员之一,已经七十多岁了。他请我到他家去做客,他的家建在安曼最高的一座山峰上。那天晚上他把我带到院子里,指着对面以色列方向的灯火,对我说,那里是他的故乡,是他的祖父长眠的地方。他办孔子学院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一天戈兰高地周围的人民可以自由来往、没有仇恨,他可以带着全家人去给祖父扫墓。

半个月前,日本十二家孔子学院相聚一堂,召开全日孔子学院联席会。汉办派副主任和前驻日教育参赞前去参会。飞机上寥寥数人,当我们的代表到达会场的时候,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日本孔子学院的代表们都激动地说:“越是在两国政治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越能看出孔子学院的重要作用,就是要主动维系和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理解。”

我举上面三个例子的意思是想说,振兴汉学、发展新时代的汉学,不仅是在场的专家学者的热切愿望,更是世界各国人民和孔子学院办学的需要。我知道,孔子学院不可能成为包治百病的医院,但是至少也要承担起类似心理医生、家庭医生的职责和义务,应该成为中国和各国人民思想交流、心灵碰撞的场所。这就需要人文学家、社会科学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和贡献。我们绝不干涉学术自由,但也不希望学术被误解和偏见所笼罩。我们欢迎各国专家和学者有话直说,帮助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之后汉办还会义无反顾地支持举办世界汉学大会,借此机会,我要再次感谢在座很多的专家学者为孔子学院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感谢各位专家和学者的支持。

借此机会,我还想说,与国家汉办共同举办世界汉学大会的中国人民大学在整整一个月之前刚刚度过了75岁的生日。作为中国高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领军者,中国人民大学对世界汉学大会和孔子学院的发展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相信,本届大会也是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最好祝福。

最后,请允许我宣布,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圆满结束。

让我们相约,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再见!



2012年11月5日,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报告厅正式闭幕。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国务院参事许琳、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孔子学院总部高级顾问纪宝成教授致闭幕辞。

网络新闻社/摄

##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致辞

尊敬的许琳主任,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学者,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即将闭幕。自2007年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以来,已经过去了五个春秋。我很荣幸见证了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办。今天再次站在这个讲台上,许多美好的印象宛如昨日,然而正像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所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我们的一切精神传统和文化经验都是充满生命的;有生命的东西比语言所能概括的内容丰富得多,可能还会抗拒语言的表达。因此最深刻的记忆得之于交往——与贤者交往、与邻人交往、与不同于我们的他者交往;在这些交往当中,印象和记忆不断更新,从而凝结成生命的体验。以此而论,大会闭幕从来不是关闭,却应当是重启——重启交往之门,召唤下一次对话。我想这正是我们定期举办世界汉学大会的意义之所在。

从第一届大会以“文明对话”提点汉学研究的立身之本,第二届大会以“跨文化交流”申张汉学研究的价值命题,世界汉学大会始终倡导文化间的开放、互动和包容。这一点其实也是古今贤达的共同理想。所以虽然英国被称之为“英伦三岛”,却正是英国诗人邓恩(John Donne)意识到:“任何人都不是是一座岛屿,而是



网络新闻社/摄

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

任何影响都是双向的;在文化的意义上,只有对话,而没有独白。我们所亲历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每次都从中外经典中各取一句箴言,我以为这绝非矫情,却正是因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中外古代智慧交相辉映,启迪深思,确实可以为我们提供跨文化、跨时空对话的典范。而从共存、共容,到相互理解乃至相互欣赏,这本身就是“与时偕行”、“因势而通”。

就中国自身的学术来说,国学大师王国维晚年的工作曾被陈寅恪先生概括为“释证”、“补正”和“参证”。其中“释证”是指在“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疑文”的比较对勘,“补正”和“参证”则都是借助外来之学,即:“异族之故书”和“外来之观念”。陈寅恪甚至认为:“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异族之故书”和“外来之观念”虽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外”之“外”,但是其内在精神同样指向了文化交流所带来的思想互动和知识重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的连续召开,中外著名学者的积极参与,既透露出世界对中国文化、中国经验的更多兴趣,也表明中国学界对“外来之学”的重视和尊重。不同的文化当然存在差异,然而差异恰好成全着独特的视角,激发着独特的问题,使我们彼此相互赠予,也相互回馈。

与往届相比,本届世界汉学大会主题和内容都带有更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当今世界的背景下,汉学乃至广义的中国研究,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方法的多元、学科的会通、中外的互渗、问题的深化。本届大会的论文既涵纳了比较研究、翻译研究、接受与影响研究等传统汉学领域,也扩展到“中国道路”与世界经济秩序、文化差异与国际政治走向等热点问题的探讨。大会特设的“中外文学获奖者论坛”还组织了“文学与世界”、“文学与思想”、“文学与我们”三组对话。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因卡(Wole Soyinka)、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最佳小说奖获得者努涅斯(Sigrid Nunez)、英国安可奖获得者朱莉娅·李(Julia Leigh)、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阎连科、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震云,以及80后作家

的代表、春天文学奖获得者张悦然与中外批评家汇聚一堂,吸引了许多与会代表和专程前来的旁听者。

女士们、先生们,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谈到中国文化的时候说过,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现在的西方人正好走向另一个阶段,认为技术上的功效最可贵而道德毫无用处。一两个世纪以来,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在现代化的旗号下,科学主义、工业主义、消费主义日益泛滥。认为技术上的功效最可贵而道德毫无用处这种社会思潮、价值取向,这种实际倾向一直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反复上演,在最近二三十年的中国同样存在。在世界范围内,那种单纯的、偏激的、狂妄的科学主义、工业主义、市场主义、消费主义对人类的命运形成实实在在的威胁。金钱至上、道德沦丧、物欲横流、资源恶耗,对人类文明形成了空前的消解和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讨论的就不仅仅是不同文明的开放互动、相互借鉴、共存共荣的问题,而是还要进一步讨论不同文明的开放互动、相互借鉴、共存共荣究竟是为谁的问题。我以为,如何共同面对和解决全世界一两个世纪以来不断提出的上述共同的当代人类难题乃是我们的共同任务。因此,世界汉学大会实际上应当同时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与世界不同文明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共同面对和解决我刚才称之为当代人类难题的论坛和纽带。我相信中国人民大学一定会为推动这一人类崇高目标的实现持续做出自己的努力。

女士们、先生们,我与世界汉学大会一起走过,如今我也已经是走向“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这样一个年龄阶段了。每个人都会变老,但是我相信学术不会变老,我也希望世界汉学大会不会变老。清代诗人龚自珍有两句诗,正能表达我此刻的心情:“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祝贺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的成功,期待下一届世界汉学大会的学术盛宴,也期待着“孔子新汉学计划”催生更加绚丽的鲜花。

## 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程天权告别晚宴致辞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亲爱的朋友们:

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已经圆满地闭幕了,各位嘉宾即将陆续离开北京,因此,我们今天晚上为参加大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饯行。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谢谢各位前来参加大会!并由于各位的努力,使本届汉学大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对此表示热烈的祝贺。

两天来,中外学者进行了热烈的交流讨论,尽管窗外秋风萧瑟,但室内切磋争鸣尚有余温,谈笑应答犹在耳畔。学者们围绕“汉学与世界”进行了讨论,汇集了思想、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各自经验和真知灼见,不仅推进了传统汉学与中国研究的进一步融通,也为中国自身的学术提出了新的挑战。那就是围绕汉语文化的多学科研究成果,如何向更广阔的人类世界和更普遍的人类处境展开。我们能否通过学者们的研究,使中国古代智慧在世界性的大变革中,获得新生。我相信,这正是“与时偕行”、“因势而通”的定义所在,也是本届大会借中外古训所表达的期待。

今世界”进行了讨论,汇集了思想、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各自经验和真知灼见,不仅推进了传统汉学与中国研究的进一步融通,也为中国自身的学术提出了新的挑战。那就是围绕汉语文化的多学科研究成果,如何向更广阔的人类世界和更普遍的人类处境展开。我们能否通过学者们的研究,使中国古代智慧在世界性的大变革中,获得新生。我相信,这正是“与时偕行”、“因势而通”的定义所在,也是本届大会借中外古训所表达的期待。

文学与世界：自由和个性的挖掘

第一个发表演讲的是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他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位为自由、为信仰不懈奋斗的作家，在现场分享了他关于文学的“自由”和“禁忌”的思考。

在深入话题之前，索因卡祝贺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并认为“这是对一切文学和自由的支持者莫大的鼓励”。同时，他表示参加本届世界汉学大会是为了“呼求自由，呼求我们今后应该如何去解释‘人’本身”。

作为一名作家，写作是一个创造的过程，索因卡认为这种“创造”实际上是一种欲望的表达，但人类本身的创造不仅体现在写作层面，更要伸展到其他艺术层面。他提倡：“我们要拆除一切樊篱！我们要破除与任何其他同类之间的联系，破除物理、破除各种技术的发明，即使这些以魔术般的方式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

索因卡始终关注人类本身的生存状态，但他认为生存已经“被困在僵化的教条和自由探索之间”。在这一话题上，他对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首先，他批判了“反对心智者”。他认为，创造性本身一直是面向于不同的领域，是开放的。正因如此，让反对心智的人感到自身的安全性、稳定性受到了威胁。因为对于这群人而言，心智完全是通过限制获得的，尤其是在非物质性的领域，比如说“作为一个作家的根基的想象力”。他们寄托于教条的操纵来放置他们已经过时的、古老的理念，通过洗脑来限制人们的想象力，通过诱惑给人类描述了一个虚假的形象世界。对这些“不能容忍的、发明禁忌的操纵者”，索因卡认为：“实际上是一种神权的和世俗的政治的结合，他们不允许任何人质疑”，为了追求对心智的操纵，他们发明“禁忌”以占领人类想象力的空间。

其次，在关于“禁忌”的理解上，索因卡解释道，他所讲述的并不是古代的一些风俗的禁忌，而是现代社会中被发明出来以限制世界的教条。提到宗教，他认为其阻碍了人类想象力，尤其是在犹太基督教中“除我之外不能有其他神”和“不许吃禁果”的论述，建立了一种不容挑战的“禁忌”。索因卡把这些“禁忌”的发明者称为“社会上的思想警察”，并指出他们抱有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目的，对正统产生了挑战，对人类本身的影响非常深远。



最后，索因卡重申了“我思故我在”这句话。他认为，“我思”在根本上是一种遐想和臆断，是一种没有限制的思考，是人栖居的理想之地，也是人对权力、宗教和世俗的挑战。“挑战”就是一种“创造”，因此，索因卡呼吁：“让我们去想想那些对现实的更多的挑战，这种挑战就是——我创造故我在。”

对于索因卡发言中谈及的政治、权力、自由和禁忌，与之对话的阎连科认为：“这是我们经常思考而没有思考到、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如果我能够代表大家的话，将对他的发言表示尊敬。”

接下来，阎连科的发言则以“巨大的世界与最小的我”为题，共分为三个部分，即“我的文学”、“作家形象”和“文学土地”。在这一点上，他认为，很多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品讨论的恰恰不是世界性，而是在世界文学中讨论了“什么是‘我的文学’”。阎连科指出：“正是因为有了‘我性’，才有了世界性。”而关于“我的文学”，具体而言就是在文学中讲述自己的故事。同时，阎连科也说了他的文学宗旨，就是“要在说不清的地方说清楚”，认清在追求“我的文学”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思考，并将文学看做认识世界的方法和途径。而关于文学的个性与世界性，阎连科说：“要用自己的文学思维去辨析和追求世界的文学思维，正是文学的小个性、小脾气、小撒娇才能透视文学的大个性，才能去谈论世界性。”

在第二点上，阎连科指出作家的身份必须在作品中取得认同，“有了‘我的文学’，才能有‘我’这一作家。一个国家的作品最好是讲述本国的故事，以塑造自己的形象。就像我们阅读鲁迅的作品，鲁迅的形象甚至比人物的形象更鲜明。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就能感受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焦虑、困惑和痛苦。”对于他本人的形象，阎连科也笑谈：“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不完全的阎连科，而阎连科这个形象在我的作品里才更完整呈现出来。”在第三点上，阎连科倡导道：“每一个作家都有个人性的文学土地，这并不是指红土、黑土或黄土，而是洋溢着作家本人的文化意识的文化土壤。只有那些属于‘我’的，在自己的文学土壤中开出的文学之花才具有广泛恒久的意义。”而他也自称：“我还在寻找和培育着这片土地。”

2012年11月4日上午9点，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中外文学获奖者论坛”在国学馆报告厅隆重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了沃莱·索因卡、阎连科、西格丽德·努涅斯、刘震云、朱莉亚·李和张悦然共六位中外文学获奖者进行主题对话，多位国内外著名作家和学者进行了回应和点评。本次大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耿幼壮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众议教授发表了主题致辞。

本场论坛分为三个环节，作家们依次对“文学与世界”、“文学与思想”和“文学与我们”三个主题进行了对话。

中外文学获奖者论坛



文学与思想：精神和远见的追求

文学家与思想家一样，面临着许多终极的哲学思考。来自美国的作家西格丽德·努涅斯与中国作家刘震云就“文学与思想”这个话题做了主题发言。

西格丽德·努涅斯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作家兼文学评论家，曾获美国怀丁作家奖等，写作领域涉及语言、记忆、认同、阶级。由于天气的原因她未能出席本次汉学大会，耶鲁大学的汉学家司马懿宣读了她的演讲稿。其中，西格丽德·努涅斯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为写作？写作的思想从何而来？”

她引用一位作家的话回答：“我们写作，并不是因为有思想，而是因为故事。”文学作品的思想比故事重要，但她写作的启蒙老师曾对文坛上一些没有思想的作家提出批评。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与思想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是有争议的。“在昆德拉看来，小说家不应该过于重视作品里的思想，而应该自由地发挥，同时对纳博科夫来说，宏大的思想在文学中就是垃圾；与之相反，苏珊·桑塔格却相信，文学作品里唯一重要的就是思想。”

西格丽德·努涅斯认同苏珊·桑塔格的看法，她相信文学作品的魅力离不开思想的光芒。但是她认为，小说家的思想不同于哲学家。“正如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所说，小说的智慧与哲学不同，创造小说、诗歌的精神也不同于理论的精神。”她结合自己阅读和写作的亲身经历，试图去探寻文学作品里真正的思想。“我从自己的角度，对世界有一些看法，于是我想要去写作去表达，然而我的看法是否就是苏珊·桑塔格认为的思想？作为一个作家，他究竟应该具备怎样的思想？我想，如果她还活着，她也许会写一本书来阐释这个问题；而如今她去世了，她本身就成就了这本书，以供我们寻找答案。”

对于“文学与思想”这个议题，曾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刘震云，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了阐述：一、文学思想之重要；二、中华民族、中国文学的思想；三、中国当代文学作家的思想性。

首先，他坚定地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一定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从某个角度思考的只是某个领域；而作家用情感思考的却是整个人类和历史的整体。“中外伟大的文学作品都证明，如果文学是一幢大厦，思想之于文学，就像大厦的地基一样重要。没有强大和独特的思想支撑，‘大厦’就淤塞和倒塌了。”

其次，他悲观地感叹我们这个民族在思想上的先天贫乏。不同于西方的海洋文明，孕育于大陆的中华文明具有典型的自内性，拒绝陌生和冒险，致使其在19世纪后被外强欺辱。1904年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失败者俄国割去的是中国的领土，这一屈辱让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缺少的不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是先进的思想！“但是中国文学又的确不缺乏思想，我们的文学界产生了鲁迅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他提到鲁迅塑造的三个典型人物：欺软怕硬和善于精神胜利的阿Q、勤劳善良却蒙昧啰嗦的母亲祥林嫂、又穷又憨毫无思想的知识分子孔乙己。

刘震云说：“中国当代同样不缺乏具有思想的家”，他提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他认为莫言获奖是实至名归，“但是莫言并不是唯一有资格的获奖者，因为这涉及到顾彬先生先前谈到的翻译问题。就目前而言，汉语还是一个弱小的语种，如何让中国文学走向汉语以外的世界，仍然是一项重要的工程，如果用汉语来评选，中国目前至少有十个作家可以与莫言一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们都算是上有思想的家。”

最后在回答观众提问时，刘震云阐释了衡量一部作品、一个人、一个国家是否有思想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眼光”——看问题的出发点、角度和时间跨度即远见。“一本书，一个人，一个民族莫不如此。”

文学与我们：形式和语言的探索

“我是一名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电影制片人。因此今天，我主要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谈谈文学与电影之间的关系。”来自澳大利亚的青年小说家、电影导演朱莉亚·李通过自己在文学与电影领域中的独特视角，阐述了她对于书写方式独创性的思考。

朱莉亚·李介绍到，她在不同时期写出的作品的表现形式都不一样。她的前两篇小说《猎人》、《不安》即在书写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不安》在风格上既不像一个剧本，也不像一个小说。事实上

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写作都有不同的认识，一个作家从一个小说到另一个小说，其写作经验也很不一样。”接下来朱莉亚·李谈到她的第三部作品，她认为该作品在形式上更类似于戏剧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作家并不会以一种写作者的身份进入到作品中去，而是以一种外在的立场来描绘主人公的行为与姿态。”朱莉亚·李认为这部作品在她的写作经历中有着分水岭的意义，她的作品从此开始带有电影“纯粹外在书写”的色彩。同时她表示，这种“外在书写”风格的形成，事实上也意味着对自己的书写方式所造成的约束。

“事实上，我并不是拥有这种书写风格的唯一一人。”朱莉亚·李为我们介绍了其他将小说写作与电影表现艺术结合起来的作品。例如雷厄姆·格林的《第三人》既是小说，同时又被改编成了电影，而其小说文本也带有强烈的实验性质。“它在形式上像是一个剧本，而在历史设定、问题与回答上则仍然具有小说的鲜明特征。”

朱莉亚·李最后还谈到了外界因素对作家创作的限制。“就拿我最近的一次经历为例，我看了一部阿根廷的小说，它非常有艺术性，我曾试图将其改编为一部电影。”她介绍到当初主创们在讨论的时候，为了凸显电影的艺术效果，她曾想过以西班牙16世纪的社会为大背景。但是因为这个构想需要大笔资金来支持，并且影片里没有吸引大众的噱

头，因此主创们便放弃了这部影片的创作。“我对于这种因为外界干扰而造成的艺术创作的失败感到痛心”，朱莉亚·李说，“我真心希望有那么一天，当对于创造选择的限制被去除掉的时候，我们的文学与文化能够越来越强大，能够传递到更广阔的地方。”

与朱莉亚·李对话的是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张悦然。她同样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阐发了中国年轻一代作家在创作中所面临的困惑。“八零后作家与中间代作家被出版界明确地界定出来，以区别他们与前辈作家的不同”，张悦然说，“在我看来，这种不同只是因为前辈作家在其所擅长的题材上已经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而我们只能用这种题材的不同来慰藉和鼓励自己。”在她看来，年轻一代作家与前辈作家的不同被过分夸大，事实上，这种不同只是年轻作家在沿袭前辈的道路上所探寻的微小突破。

“我们这一代作家与前辈的不同，首先在两代人之间阅读的区别。”张悦然解释道，年轻作家与前辈作家的文学阅读都是西方文学，然而区别在于，年轻一代作家对经典作品的阅读明显下降，西方当代作品成为阅读的主体。这其中，出版界的干预作用是极其强大的。“外国人可能很难理解，对于当代的年轻作家来说，没有读过托尔斯泰和福楼拜并不是可耻的，没有读过村上春树和玛格丽特·杜拉斯才是。”张悦然强调，经典的没落与阅读的多样化，这是年轻一代作家应该重视的问题。

接下来，张悦然谈到了年轻作家的小说中背景迁移的现象。她指出，八零后作家在进入大众视野之后，反映他们童年乡村生活的文本创作越来越少，甚至消失殆尽，“乡村经验遭受了强势城市生活的冲击，中国作家一直以来的乡野情愫被无情割断”。同时，张悦然也谈到大城市中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日益趋同且越来越模糊的面目，这使年轻作家笔下的城市生活失去了生命力。“年轻作家如何沉入城市生活的深处，寻求中国独特的城市生活经验，我想这是年轻作家应当思考的。”

最后，张悦然还谈及了文学语言的变迁。她认为，随着标准化书面语言的普及，具有地域性特色的方言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年轻作家的作品里。年轻作家更热衷于日本翻译体的语言，这种语言固然规范、优雅，但却会使汉语失掉原本的活力，甚至会有“同质化”的危险。



结语

论坛接近尾声时，同样身为作家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马俊杰教授对以上讨论进行了总结。他为不同语言的文学能够对话和沟通感到欣喜，并对与会的获奖者表达了敬意。同时，他希望今天的“中外文学获奖者论坛”能够让文学再次吸引世人的目光，并期待今后的文学家能够在创作中还还原历史的真相。“希望文学的创造力能够呼唤和引领人类走向可能幸福的明天”，马俊杰教授借用索因卡这句话为本次论坛画下圆满的句号。



冯殊娣

我常常想，我们汉学家要怎样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呢？我想以传统中医药为例来描述一些具体的做法。我曾经看过一些中医药的文章，它们都认为自己是在以全球视角讲中医药发展，而实际上都是历史性的视角。现在，不同版本的中医药理论遍地开花，在美国，中国传统医药的发展被说成是“异类”药品的一种方法，而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因素。中医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会不断地影响更多人，但实际上它们传播的究竟是什么？

举一个例子，中医有“肝郁”一说，这在中文里与“抑郁症”近似，这种“抑郁症”非常难翻译，甚至在西方医学中用英语解释都十分难。汉语中用“停滞”、“堵塞”这些词来解释，但你需要通晓中医病理学才能明白什么是“停滞”和“堵塞”。中医中的“气”的确会堵塞，我们因而会上火，而这种上火是从我们停滞的气上升出的，无法遏制，我们的脾气就会忽然爆发出来，这就是“肝火旺”的症状。对于懂“气”的国外汉学家，这些都能理解，然而其他得这种病的人不会认为有“气”存在。

我们要去思考如何调和我们的不同性，我们不应该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去理解中国医药，而是应该以

一般人的身份来看待这种焦虑和不幸。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很难去想象这种“气”在一个人身体中起到何种作用，但是真正理解之后你就会知道这种“堵塞”是怎么回事。我看到很多汉学家也遇到这样的挑战，这次会议，他们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中国国学和国际汉学都致力于在过去与现代之间、不同的语言之间以及不同思想家之间进行转译，我们要寻找共同的基础，这样才能在全世界范围之内重新启动汉学。

杨念群

我是从医疗史的角度来看医学在中国本身的发展变化，这涉及了汉学面临一个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西医进入中国之后，它不仅是一个医学的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社会、文化的问题。我将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理解医学在中国的传播。

谈起医疗史，我想大概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是“身体”。中国人对身体的看法与西方人对身体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中国完全靠内在的治疗方式使自己的身体康复而不切除

病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维系了生命的延续，但最终这个人的状态是完全病态的。所以外科手术传入引起的是一场身体革命，当西医传教士的第一把手刀切入中国人的身体的时候，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发生了。西医通过外科手术将瘤子切除，在外国人眼中，切除是使中国人的身体得到一次新生，而中国有个传统说法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能损伤的。外科手术在中国人的概念里，可能和“采生折割”这种违背法理的行为有某种联系。

第二个关键词是“空间”。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特别强调的是熟人社会，拒绝陌生人介入。而我们知道外科手术中，最重要的程序是在一个封闭、无菌环境中进行治疗的，这给中国人造成很大的误解。再如，外科手术要穿白大褂，而在中国文化里白衣服是在葬礼上穿的。所以很多中国人在进入医院时感到非常不习惯，一批陌生的人把他抬到手术台上，任其宰割，这令人感到很恐怖。

# 医学文化中的中西碰撞

然而这种社会和上的误解通过逐渐融合、对话，得到了某种消解。比如有些人把外科手术放在村外的大树下进行，公开进行眼科手术，这样的公开化后外科手术变得透明了，之后就开始被慢慢地接受。

第三个关键词我认为是“制度”。西方是一个基督教社会，我可以把我的身体委托给上帝的仆人——医生来处理，教堂和教会的

延续在西方医疗史里也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中国没有真正封闭的空间，中医一般是坐堂或者行医，到患者家里去，患者家人可以随意支配或影响中医的决策，也可以参与其意见。我认为这不是医疗的问题，而是所谓制度的问题，是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生活文化社会差异性的体现。

第四个关键词是“社会动员和国家”。某种医疗行为可能就是社会

动员的一个表现形式。比如，1952年抗美援朝反细菌战，说美军扔了很多细菌弹，污染了朝鲜环境和中国东北地区，这本来是一个军事行为，但后来通过反复社会动员变成了一个爱国卫生运动。所以社会动员和社会运动同样可以成为医学的表现形式。

(录音整理:孙敬一)

# 汉学研究的区域差异

卢金

中国学在俄罗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传统。早在17世纪，这两个实力强大的帝国就在远东地区进行了接触。最初的信息来自远赴中国的使团和商队，他们带来的信息对于在俄罗斯发展中国学起到了重要作用。有趣的是，很多俄罗斯的外交使团还有别国人参加，外交使团回国之后，他们对中国的描述对欧洲思想也产生了影响，比如洛克，他在18世纪不止一次跟随俄罗斯使团到中国，而哲学家孟德斯鸠也在自己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中提到了这些外国人对中国的描述。

从1755年到1956年，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团盛行。事实上，在19世纪末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建立之前，传教士团就代表了俄罗斯在中国的利益，并成为了中国的重要来源。许多传教士

团成员成为了中国学家，并撰写了他们在的生活和研究，编纂了很多辞典和教科书，而传教士团里艺术家的作品也成为了解中国的素材。而在19世纪，其对中国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整体的水平。

放眼20世纪初的苏联，中国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莫斯科等大城市的一些研究机构开始对中国进行研究，并在一些重点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苏联解体后第一个十年，国家对学术研究拨款明显减少，影响了中国学的发展，但在近些年情况有所恢复，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更多人对于汉语的兴趣。早在1978年，我就选择了学习汉语，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因为在当时学习汉语是一件很罕见的事。如今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汉语已经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语言，

而原因是显而易见的。2010年以来，中国在俄罗斯贸易伙伴中排行第一，精通汉语的学生更容易找到待遇优厚的工作。今天俄罗斯有几十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仅莫斯科市就有三所孔子学院，而全俄罗斯共有八所。但这远远不能满足公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渴求。我们知道，今天在俄罗斯还有很多的俄罗斯大学开办孔子学院的申请书，在俄的中国学方面的科研机构也竞相争夺青年人才。

令人欣慰的是，国家也开始重视对中国学的研究。从2004年开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东亚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开展了中国学研究工作，有些外交官员和学者在那里工作，并将中国学知识应用于俄罗斯外交部的具体外交策略中。今年，我们完成了一个名为《中国与俄罗斯交往四百年》的项目，这是俄罗斯对中俄关系做出的首次全面研究。最后，很高兴给大家作这个报告，希望今后可以得到汉办支持，继续高举俄罗斯中国学旗帜，谢谢！

程章灿

我今天的讲题是“汉学研究的三个世界”。中国是这种学问的第一个世界。中国人研究中国的问题，一般称之为“国学”。有人将中国学术分为汉学和宋学两类，这其实是十分粗略的划分。汉学里面有宋学，宋学里面也有汉学。这是中国传统汉学的意义，与我们现在所讲的汉学不同。比如在汉学这个领域里，清代汉学可以分作吴派、皖派和浙中派。这些都是国学可以汲取的源头活水。可惜的是，经历了“文革”十年，国学学术的脉络在中国大陆基本中断。古典学术研究的传统，犹如庄

子书中所写的“混沌”，被大肆破坏。在20世纪90年代，“国学热”在大陆再度兴起，提倡国学的言论五花八门，其文化与政治需求也各不相同。在我个人看来，倘若不能对经学传统、经史子集以及知行合一的传统有深刻认识，便很难激发中国固有学术之源的生命力，更谈不上继承和光大传统学术。

日本、韩国、越南等尊崇汉文化的国家可以称为这种学问的第二个世界。日本研究中国学问由来已久，无论是东京学派还是京都学派，都产生了不少知名著作。近代受西方学术影响而兴起的中国研究，被称为支那学或东亚学。支那学含有贬义，后来废而不用。现在大都称之为中国学。日本学者曾说日本读西书的能力强于中国，读汉文的能力强于西洋。当年是否如此，以及今天是否依然如此，这里暂不讨论。但近代以来，日本学界处于中国和西洋这两个学问世界之间，确实取得了左右逢源之便利。

欧美及其他非汉文化圈的国家

(录音整理:吴静怡)

#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文化反思

代田智明

东亚的现代化是后进步的。西方产业发展后，作为殖民地，东亚各地区被迫现代化，形成了民族国家。对于中国20世纪前半期的衰落，学术界尚未给出答案，不过大家一致认为这是鸦片战争以后欧美国家和日本的侵略结果。这意味着中国在现代化的问题上，“近代”和“现代”之间既存在密切关联，又有深刻断裂。所以，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都认为应该把社会与国家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像西方那样凝聚性的民族国家。我觉得中国种种矛盾的原因之一就是意欲建立这样凝聚性民族国家的激进思想。从外力压迫的现代化观点来讲，人文科学方面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思想上的“内面”的问

题。柄谷行人曾说，前现代化人的“内面”是从外边规定的。比如看风景时，前现代人通常以看“山水画”的方式看眼前的风景，这样“山水画”的画面才有现实写实性。可是现代化以后，看风景时用现代的远近法来看，即“内面”有了一个保持实体感的焦点。现代人认为这个实体感就是自我的存在，所以现代人一直问“什么是自我”。

日本有位学者这样说，追问“什么是自我”的现代人是不满足于外在性的认同，自己要找到一个不能同于外在性的崇高个性，现代人就是一个抱有“寻找自我”与“自我检讨”命运的人。19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进步，社会、个人的内面被认为是重要的志向。这就是所谓“向上进步”的内面化。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流行“否定自己”的思潮，50年代

以来中国政治运动中推行“自我批评”，虽然这其中有着强迫因素，但是有的部分却都是现代化内面的必然倾向。“文革”之中，知识分子受到工农兵的谴责，主动进行自我批评，也都是现代化以后反复自我检讨的方式，是外压带来的现代化在人的精神方面影响的结果。

孙郁

代田智明教授主要讲了关于西方现代性非理性的转移的话题，以及对20世纪中国本地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的关系。海外学者看待中国文化有许多好奇心和夸赞，而我的发言则是对百年中国文化以及现代性接轨中不好的经验的反思。

中国的文学理念一步步走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道路其实是一个逻辑过程。其中，瞿秋白起到重

要作用，他对“五四”新文学的批判构成革命文学合理性的逻辑。列宁主义对孟什维克的批评和对普列汉诺夫的批评，是基于革命的需要，它把文化引向了以政治为核心的道路。中国不具备如此的基因和传统。比如，鲁迅最早走向左翼是借鉴了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的资源，是从文学走向革命，而瞿秋白与鲁迅相反，是从革命走向文学。瞿秋白置鲁迅的审美经验于不顾，绕过鲁迅思想中矛盾的、不确定的思想的存在，而抓住对自己的解剖和批判，将鲁迅与高尔基相联系，认为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他对鲁迅的肯定是基于鲁迅的“战斗精神”和“不妥协”的态度，这与斯大林、列宁的革命斗争精神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亦与高尔基相似。他对鲁迅的肯定实际上窃用了卢那察尔斯基对高尔

基的论述。事实上，鲁迅与“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的论争非政党因素使然，而是知识分子角色定位的问题；瞿秋白将鲁迅思想的复杂性简化了，抹杀了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鲁迅的特征。与高尔基的动机相比，二者相差甚远；其一，鲁迅乃士大夫出身，而高尔基是底层流浪文人；其二，鲁迅始终与执政党对立，而高尔基早年和晚年发生巨大变化，其与斯大林呈现主人与奴仆的关系，精神具有复杂性；其三，鲁迅气质与许多同路人相似，而高尔基后来完全站在斯大林一边。虽然他早期批评列宁观点，但后来的转变与鲁迅一以贯之的思想态度相比有很大差别。后来毛泽东把鲁迅列为一等圣人亦是瞿秋白理念的延伸。

由俄国而来的批评模式在中国流行了很多年，成为制约

文学发展的外在力量。直至上世纪80年代乃至现在，在许多青年的努力下，文学批评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这是充满苦斗的过程，是逐渐告别瞿秋白而向鲁迅靠拢的过程，是告别毛泽东而回归普列汉诺夫的过程。莫言的创作开始与鲁迅当年介绍的审美画面接近。鲁迅所理解的革命文学在莫言这里得到还原，但不被人理解。可见，回归“五四”语境和鲁迅传统是多么的艰难。

最后，我想提出几个问题，在百年中国文化的选择中如何避免精神的单一性和悲剧的发生？在泛道德化和泛政治化语境之外，今天以欧美为中心的现代化追求是否会出现当年以俄国为中心的问题？这些选择中的陷阱是今天关心中国文化发展的人们所不能回避的。(录音整理:王斯璇)

# 访谈

## 中西哲学思想下的汉学比较与融合

专访黎建球教授

姚惠桥

记:据我所知,这是您第三次参加世界汉学大会,请问您在这届大会上为我们带来哪些您的最新研究成果,或是一些您比较感兴趣的研究点呢?

黎:首先,我要讨论的是我们是否应该给汉学“正名”的问题,就是用“汉学”这两个字是否正确。基本上现在研究的“汉学”不是汉学,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研究的是整个中国,所以就应该叫“中国学”,而“汉学”可能会被以为是“汉朝的学问”。在英文中,sino这个词本来就有“中国”的意思,它是从印度梵语的cinah演变过来的,本身就是“秦”,所以它在外国人看来不容易产生误会,而是我们的翻译出了问题。第二,我认为“汉学”即“中国学”的研究应以中国为主体,所有的题目都应该围绕中国来讨论,目标就是怎样让中国的东西给世界一个新的理解、认识,甚至能够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学问。我们要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找出一套既符合中国传统又能发展到未来的学术脉络。这种脉络,你可以用西方的思想来诠释,但不能以西方的思想为主体。第三,很多西方研究汉学的人不懂中文,但我觉得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很好的翻译本。因为你不能期望全世界都懂中文,即使不懂中文他们也可以借着翻译本了解中国。举个例子,全世界有多少人懂希腊文、拉丁文呢?但《圣经》翻译得那么好,可以放在全球每一个国家,借由翻译本弘扬它那个宗教的意义和价值。这才是我们今天要面对和讨论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加强翻译,对翻译不能有一丝懈怠。翻译最糟糕的,举个例子来说,比如“易经”,他们把它翻成“change”,但“易经”不只是变化的意思,它有三个意思,“不易、变易、简易”,翻成“book of changes”就像话了吗?我们也不能直接用“易经”这个词,因为那样人家也不懂。如果海峡两岸学者的真的有心,我们不应该组织一个联盟,不只是翻译,而且还有具体的行动的展现。

记:您是辅仁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受过完整的天主教哲学的训练,同时也在研究西洋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比如荀子、朱熹等,那您觉得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共性在哪里?它们最大的区别又是什么?

黎:先说区别。西方哲学比较系统化,这正是中国哲学所缺乏。因为没有系统化所以很多研究成果都只呈现在个人。其离世后,后来人创发的可能性就很小,只是一种“因袭”,但西方哲学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亚里士多德、康德,很多后来人对他们进行批判。我们中国的哲学很少有批判精神,多半是学生承受了老师的教导,谨守着不敢有任何的变动,如此这样,一种“僵局”就出不来。借着批判,可以看到很多新路可以走,发展出新系统,这就是进步。至于共性,有人说的“东方出圣人焉,西方出圣人焉,此心同理。”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方法不同,达到的程度不同。有人问,中国传统的哲学中有没有所谓的“民主自由”?很多人都在批评儒家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帝王服务,这明显是从汉朝开始的。在这中间有

没有民主思想,不少人会提到“民本”,也就是孟子的思想。但孟子思想不是民主。因为民主不是“以人民为主”,“民本”的思想里有君王,君王要关心人民。但“民主”和“自由”这两个词,“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自由”是基本人权。所以政府是让人民生活在一个民主制度之下,而且还要保障人民的自由。

记: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非常深入,但现代有一些中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是没有哲学的,也就是在质疑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黎:这个可能有不同的定义吧。如果你要从西方定义的哲学来看,中国人没有像西方人那一套的哲学理论的架构。但如果从哲学的内涵来看,因为哲学的内涵是“追求智慧”,那中国哲学全部都有。这是不同的解释,中国的思想是非常丰富,非常深厚的。所以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五四的时候高喊“打倒孔家店”,这就是在质疑中国的哲学,今天对中国哲学的质疑,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可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是,胡适之死了,但中国的哲学还在,所以它经得起批评。我们对中国哲学其实不用太担心,照着那个规律去做就可以了。“中国没有哲学”,那是主张“全盘西化”思想的人在质疑中国哲学。

记:从传教士来华开始,西方思想开始逐渐传入中国,那您觉得这些西方思想的传入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大冲击是什么?

黎:我想先澄清一点,西方的传教士是没有颠覆中国的,是中国人到国外学回来以后,颠覆了中国。中国人去外国学回来了,就要打倒中国文化,觉得西方那一套好。所以不是西方人在打倒中国文化,而是自己打自己。我可以讲,没有一个西方传教士在颠覆中国文化,也没有一个西方的学者来中国颠覆中国文化。因为颠覆不了,他与中国没有什么关系。跟中国有关系的是中国人。但是实际上这些从西方念书回来的人并没有真正理解西方文化的深蕴,西方的民主、自由、博爱都是从宗教来的。在静心堂外面望弥撒,没有规定的位置,这就是自由,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上帝的子民。博爱就是大家彼此相爱,这也是从宗教精神中来的,不过后来因为西方的帝制跟宗教结合在一起,而把这个破坏掉了。在中国,儒家成为帝王的“帮凶”,不也是一样的做法吗?不是这个学说不好,而是人的问题。比如在台湾读《礼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为什么?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诠释。这个和《礼记》无关,有关系的是讲《礼记》的人。那些到西方去念书念得不成熟的人回到中国后其实是在“乱讲”,不过这种“乱讲”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只是这个方法是否合适是需要反思的。

记:这次世界汉学大会的主题是“汉学与当今世界”,那么您觉得汉学的研究会给当今世界带来什么有益的指导和借鉴呢?

黎:我想可能有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人类的未来,人类到底要怎么办?如果继续向民主科学发展,那它当中的内涵是不是可以有中国的成分?第二个,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在未来20年一定会成为全球最强的国家,中国一定会领导全世界。我们对20年之后的中国有什么期望?当它作为全世界领导的时候,它怎么去领导全世界?如何用这样的文化和哲学来领导世界?第三点我觉得是整理国故,就是要对中国过去的传统文化有所整理。这样我们才能指出未来我们会做什么。在这一点上,大陆和台湾应该合作。

记:今年10月,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您如何看待这件事?

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大增,很多人以为从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便可以跻身世界前列。但是在我看来,外在的奖项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做到宠辱不惊。我并不认为没有获诺奖,我们的文学就不行;也不认为获了诺奖,我们的文学就能突飞猛进地发展。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诞生的时间比较晚,因而其完成自身转型的时间还远远不够,这就涉及到“五四”的批判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导致了一系列很严重的问题。德国人在17世纪早期耻于说德语,认为其是下等人的语言,觉得很难听;但到19世纪后期,黑格尔、康德、歌德、席勒的出现,让德国人为自己的民族语言甚感骄傲,因为精神引导者他们用德语表达出了心目中优美的世界。相比较而言,中国在未来的50年到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如果读白话文作品能像读李白杜甫那样获得美的感受,那么现代语言的形构就基本完成了。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学习,要有博大的胸怀,“海纳百川”,同时要仔细辨别,在前行中找到适合自己,可以作为指导的榜样。

记:在您不断进行学术探讨和研究的过程中,最近是否发现了新的兴趣点,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

叶:我认为做学问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你要享受它。就像陈寅恪先生所

## 立足中国的『东方现代学』

专访叶隽教授

涂好运

记:您对于本届世界汉学大会中提及的“新汉学”与“大汉学”是如何理解的?

叶:世界汉学大会是一次很好的机会,能够把世界上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聚集在一起,提供一个交流的环境和空间。任何国家崛起的过程,都是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重发展,但最核心的影响还是“软实力”。“软实力”主要是文化,而文化的核心又是学术和思想。一个国家只有文化力量足够强大,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话语权,这种话语权是思想的感召力,即有能力向其他民族推广自身文化的普世性价值。“软实力”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中国经济上的迅猛发展,必然需要文化拥有新的核心和动力。在文明层次的三个基本结构里,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从器物到政治制度,再到文化思想的渐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不仅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更需要多样的文化形态。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格局需要异质文化的声音,而在异质声音里,中国文化或许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核心价值与导向意义的新可能。在大国文明的兴衰史中,能够博得众所归心的力量是一种真正具有普世价值的核心思想观。比如,我们至今还感慨的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古希腊、希伯来的先哲,印度的佛陀以及中国周秦时代的一批原创思想家的思想,确实是后代无法模拟和超越的。中国文化如何发展,关键要看我们如何挖掘传统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针对西方的强势地位,中国文化要有能力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走出去。这就要求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这也是我提倡的“东方现代学”概念的原因。

记:在静心堂外面望弥撒,没有规定的位置,这就是自由,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上帝的子民。博爱就是大家彼此相爱,这也是从宗教精神中来的,不过后来因为西方的帝制跟宗教结合在一起,而把这个破坏掉了。在中国,儒家成为帝王的“帮凶”,不也是一样的做法吗?不是这个学说不好,而是人的问题。比如在台湾读《礼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为什么?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诠释。这个和《礼记》无关,有关系的是讲《礼记》的人。那些到西方去念书念得不成熟的人回到中国后其实是在“乱讲”,不过这种“乱讲”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只是这个方法是否合适是需要反思的。

记:这次世界汉学大会的主题是“汉学与当今世界”,那么您觉得汉学的研究会给当今世界带来什么有益的指导和借鉴呢?

黎:我想可能有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人类的未来,人类到底要怎么办?如果继续向民主科学发展,那它当中的内涵是不是可以有中国的成分?第二个,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在未来20年一定会成为全球最强的国家,中国一定会领导全世界。我们对20年之后的中国有什么期望?当它作为全世界领导的时候,它怎么去领导全世界?如何用这样的文化和哲学来领导世界?第三点我觉得是整理国故,就是要对中国过去的传统文化有所整理。这样我们才能指出未来我们会做什么。在这一点上,大陆和台湾应该合作。

记:今年10月,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您如何看待这件事?

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大增,很多人以为从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便可以跻身世界前列。但是在我看来,外在的奖项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做到宠辱不惊。我并不认为没有获诺奖,我们的文学就不行;也不认为获了诺奖,我们的文学就能突飞猛进地发展。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诞生的时间比较晚,因而其完成自身转型的时间还远远不够,这就涉及到“五四”的批判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导致了一系列很严重的问题。德国人在17世纪早期耻于说德语,认为其是下等人的语言,觉得很难听;但到19世纪后期,黑格尔、康德、歌德、席勒的出现,让德国人为自己的民族语言甚感骄傲,因为精神引导者他们用德语表达出了心目中优美的世界。相比较而言,中国在未来的50年到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如果读白话文作品能像读李白杜甫那样获得美的感受,那么现代语言的形构就基本完成了。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学习,要有博大的胸怀,“海纳百川”,同时要仔细辨别,在前行中找到适合自己,可以作为指导的榜样。

记:在您不断进行学术探讨和研究的过程中,最近是否发现了新的兴趣点,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

叶:我认为做学问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你要享受它。就像陈寅恪先生所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俗谛之桎梏”,而不是做一个像席勒所说的“面包学者”。读书做学问,要尽可能地超越世俗的困扰,进入学术纯粹的思想境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学术的意义。我自己做研究大多是跟着问题往前走,兴趣其实是发现问题、探索问题的动力。我原先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史,更多从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等高端层面探讨问题;而现在会把目光下移,更多关注制度史、器物史,以及它们与制度史、器物史、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研究过程中会发觉,现有的西方理论资源还是不够的。我最近在北大德国学研究中心的大会上,谈到了中国现代学术框架下的德国学建构问题,并尝试用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来解释外来的问题,这是一种尝试,至少展开了一条新的路径。同时,我这些年主要研究的问题还涉及到一个“侨易学”的概念。它更多是一种思维的转变,主要借助东方的文化资源,讨论“物质位移和精神质变”的关系,当然这还在我当前的摸索之中,近期我会出版一本专门探讨这个问题的专著。整个学术研究过程是一个自我训练、自我学习和不断探索的过程,越学习就越感到知海无涯,越感觉自己懂得的实在太有限。一个个体在学术、知识的海洋面前真的非常的渺小。

记:您认为做学问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你要享受它。就像陈寅恪先生所

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俗谛之桎梏”,而不是做一个像席勒所说的“面包学者”。读书做学问,要尽可能地超越世俗的困扰,进入学术纯粹的思想境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学术的意义。我自己做研究大多是跟着问题往前走,兴趣其实是发现问题、探索问题的动力。我原先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史,更多从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等高端层面探讨问题;而现在会把目光下移,更多关注制度史、器物史,以及它们与制度史、器物史、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研究过程中会发觉,现有的西方理论资源还是不够的。我最近在北大德国学研究中心的大会上,谈到了中国现代学术框架下的德国学建构问题,并尝试用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来解释外来的问题,这是一种尝试,至少展开了一条新的路径。同时,我这些年主要研究的问题还涉及到一个“侨易学”的概念。它更多是一种思维的转变,主要借助东方的文化资源,讨论“物质位移和精神质变”的关系,当然这还在我当前的摸索之中,近期我会出版一本专门探讨这个问题的专著。整个学术研究过程是一个自我训练、自我学习和不断探索的过程,越学习就越感到知海无涯,越感觉自己懂得的实在太有限。一个个体在学术、知识的海洋面前真的非常的渺小。

记:您曾经写过《战国时代的盐及其相关资料的研究》的论文,又参与过“敦煌学文书的整理和研究”的课题,在

## 文字·文献·汉学

专访赵平安教授

张凡

记:在您的理解中,古文字、出土文献与汉学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赵:这三者确实有交集。通常所谓的汉学是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学的称呼,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既涵盖对古代中国的研究,也涵盖对近代和当代中国的研究,内容丰富,时间跨度大。古文字是指小篆以前的书写符号,如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出土文献指地下出土的书籍文书之类。古文字和古文都属于汉学的研究对象,由于居于源头,因而在汉学研究中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记:上一届世界汉学大会在讨论出土文献的问题时,引起学者们最大争论的是关于出土文献的研究应该关注经典的东西还是平民的东西。您是怎么看待这种争论的?今天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有没有达成某种共识?

赵:我们应该承认经典文献的典范性、权威性和代表性。出土文献的研究,一开始比较关注经典是有它的逻辑性的,毕竟我们有偏爱经典的传统。但是当关于经典的研究达到一定程度时,进而关注平民的东西也就顺理成章了。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要全面了解历史的真实,经典的东西和平民的东西都应该重视,二者不可偏废。

记:在上一届世界汉学大会上,您曾提到过,对于出土文献的研究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者的知识非常有限以至于很多东西无法正确解读。那么经过这两年的时间,您觉得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改善?或者有没有哪些正在施行的具体措施可以推进这个问题的改善?

赵:我这几年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参与清华简的整理。在清华简的整理过程中,总是感到知识不够,刚开始的时候感到不够,现在仍然觉得不够。相信所有参加整理工作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人们常说“学然后知不足”,我们是“整理然后知不足”。知识不够并不可怕,重要的是不断学习,在整理的过程中成长自己。清华简的整理报告目前已出版两辑,整理水平得到学界的公认,表明我们的整理工作是合格的,但由于我们能力有限,仍然留下一些遗憾。

记:您曾经写过《战国时代的盐及其相关资料的研究》的论文,又参与过“敦煌学文书的整理和研究”的课题,在

这些研究中必然涉及很多其他学科的知识,像这种跨学科的知识储备在您所说的研究者自身的知识方面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它是研究者必备的素质吗?

赵:你提到的论文和课题所涉及的知识面其实还是很有局限的,古文字也好,古文献也好,留下不少症结问题,有些问题要得到透彻的解决,确实要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处于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懂,但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固步自封,囿于一隅。与时俱进,尽量拓展自己的知识,是研究者应有的素质。

记:今年世界汉学大会的主题是“汉学与当今世界”,这其实是暗示了一个“大汉学”的构想,就是要打破“汉学”仅限于人文学领域的局限,从您的学术观点和研究实践来看,似乎也在走着一条“大汉学”的道路,对于您来说,这是有意识的学术选择,还是这本来就是学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赵:随着时代的发展,汉学也要注入新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赞成“大汉学”的构想,至于我自己,对于“大汉学”,心向往焉,力不能及。由于我的特殊机缘,我在文学学科和历史学科都工作过,表面上好像比较宽,实际主要还是作古文字、出土文献的研究,时间也主要局限在先秦两汉。

记:对古典典籍以及出土文献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但是在现实的情况下,很多学生却对古文字学、文献学等学科存在着一种望而生畏的心态,使这些学科成为“冷门”,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热”与“冷”之间的关系的?这样的现状对学科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赵:诚如您所说,古典典籍和出土文献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这是因为它资料越来越丰富,它能为人们提供一种取之不竭的学术滋养。这种局面对年轻学子也在产生潜



移默化的影响。不过应当说明,这种热是相对的,也只有相对的热才是正常的。毕竟这类研究只是小众的东西。

记:现在在一些公共场合,比如地铁四号线人民大学站的入口处悬挂有古代文字的宣传牌,上面有《说文解字》中的一些汉字的小篆形体、造字本义等内容,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它对古文字学的研究会产生怎样的现实影响?

赵:我始终认为,古文字是比较专业的东西,是属于小众的东西,研究的队伍不宜过大,研究不宜庸俗化。但是,汉字的美值得充分展示,谁都有喜欢汉字的权利。

记:您曾经写过《战国时代的盐及其相关资料的研究》的论文,又参与过“敦煌学文书的整理和研究”的课题,在